



海外客家研究译丛

主编 邱国锋

BLOOD, SWEAT, AND MAHJONG:
Family and Enterprise in a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血汗和麻将

一个海外华人社区的家庭与企业

[美] 欧爱玲 (Ellen Oxfeld) 著 吴元珍 译



BLOOD, SWEAT AND MAHJONG:
Family and Enterprise in a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血汗和麻将

一个海外华人社区的家庭与企业

〔美〕欧爱玲 (Ellen Oxfeld) 著 吴元珍 译



海外客家研究译丛

主编 邱国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汗和麻将：一个海外华人社区的家庭与企业 / (美) 欧爱玲 (Oxford, E.) 著；吴元珍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6

(海外客家研究译丛)

ISBN 978 - 7 - 5097 - 4593 - 9

I. ①血… II. ①欧… ②吴… III. ①客家人 - 华人 - 社会生活 - 研究 - 加尔各答 IV. ①D634.3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97744 号

· 海外客家研究译丛 ·

血汗和麻将

——一个海外华人社区的家庭与企业


著 者 / [美] 欧爱玲
译 者 / 吴元珍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责任编辑 / 仇 扬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 / 李向荣 钱月红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5.5
版 次 /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字 数 / 236 千字
印 次 /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4593 - 9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2 - 1456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Ellen Oxfeld

Blood, Sweat, and Mahjong: Family and Enterprise in a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1993 by Cornell University

本书根据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译出

《海外客家研究译丛》 丛书编委会

顾 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丘小宏 刘志伟 何星亮 陈春声 周大鸣
房学嘉 麻国庆 谢重光

主 编 邱国锋

副主编 肖文评 周云水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冷剑波 宋德剑 吴元珍 钟晋兰 夏远鸣
黄 斐 谢胜利

《海外客家研究译丛》

总 序

目前，全世界有两种人是专家学者开展学术研究的热门，一是以色列的犹太人，二是中国的“客家人”。客家人保留着古朴的客家方言，有其独特的民俗与文化心理。客家研究自一开始就呈现出其他文化少有的国际性特征和优势。学术界对客家进行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肇始于西方传教士在客家地区传教过程中记录的大量实地材料。^① 英国传教士良贝尔（George Compbell）长期在广东梅县等客家聚居地传教，对客家的历史和现状作过详细的实地调查研究。1912年，英国长老会和美国浸信会在汕头举行关于宗教的会议，良贝尔在会上就客家问题报告了他的研究成果。他在报告中指出“客家人比城里人勇敢，富有特立独行的气概，渴爱自由，普通山居的民族大都如此，客家人也是如此”，并预言客家必将对“中华民族的奋发和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② 会议结束之后，上海英文《教务杂志》发表了良贝尔的报告。同时，良贝尔又以 *Origin and Migration of The Hakkas* 为书名（中译名《客家源流与迁徙》）刊印了这份报告的英文单行本。良贝尔报告的理论价值在于运用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考察客家的历史，以发现客家的迁徙活动也是验证“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法则的论据，并认为它和“种族特性”的养成有因果关系，故而引起西方人类学界的高度重视。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将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和人文地理学研究结合起来，研究人类的“族性”课题。良贝尔的《客

① 张英明、周璐：《西方学者早期对客家与太平天国关系之研究》，《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② 罗香林：《客家源流考》，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影印本，1989，第1页。

家源流与迁徙》给了亨廷顿极为有益的启发，他认为“一切文化发生变迁，可以用自然环境——尤其是气候——来直接解释”，并指出还需要从“人口过剩与移殖所引起的自然淘汰求之”^①，将艮贝尔来自田野调查的创见上升为西方人类学研究“中国民族性”的一种新的理论预设。亨廷顿不仅提出“客家的名称，英文是 HAKKAS，在人类学上已有相当重要的地位”^②，还极力主张对客家这一独特的群体开展科学和规范的研究，认为客家人的历史很值得研究。1924年，亨廷顿以艮贝尔的《客家源流与迁徙》为资料基础，用自然淘汰和人口迁移的原则来解释中国的民族性，在美国出版专著 *Character of Races*（中译名《种族的品性》）。他对客家特性养成的原因进行理论分析，指出客家人在历史上因受荒年的困苦和外族的压迫，不得不展开漫长的迁徙之旅。“当他们迁徙时，自然淘汰的势力一定会活动，逐渐把懦弱的、重保守的分子收拾了去，或是留在后面。所以凡能够到达新地方的分子，都是比较有毅力有才干的”^③。亨廷顿强调“民族特性”是自然淘汰作用的结果，认为迁徙也是一种优胜劣汰的筛选过程。对于当时的西方人类学界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观点。

清朝中期以来，岭南“土客之争”日趋频繁激烈，客家人不仅受到客居地原住民的经济抵制，而且受到他们的文化拒斥，被视为“苗蛮之种”。因此，历史上岭南“土客之争”在文化上的深层次症结是族属之争，亦即客家人的文化身份之争。亨廷顿的《种族的品性》出版之后，由于客观上适应了汉族客家民系的建构及其崛起的需要，故而深受客家文人和中国学术界的关注和欢迎。1815年以来，客家文人徐旭曾著《丰湖杂记》，力争客家具有汉族的正统性；黄钊著《石窟一征》，力称客家方言为“中原正音”；林达泉著《客说》，力辩客家为“唐虞三代的遗裔”；古直著《客人对》，力说客家“诗书礼乐”文化之盛；钟用稣著《客家考源》，力论客家为中原嫡系之后裔，等等。在这个时期，客家文人学士著书立说，为汉族客家民系的建构作了文化谱系方面的准备，同时也促进了客家族群意识的觉醒和抗争。

20世纪20年代，客家文人乃至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学术成果及其理论方

① 潘光旦：《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商务印书馆，1989，第6页。

② 亨廷顿：《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性》，潘光旦译，新月书店，1929，第172页。

③ 亨廷顿：《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性》，潘光旦译，新月书店，1929，第120页。

法引起重视。钟鲁斋将艮贝尔的《客家源流与迁徙》译成中文，于1923年在旅沪嘉应学生会主办的《嘉应》第一卷第三期发表。亨廷顿的《种族的品性》推动了中国学术界对“粤东人种”亦即客家问题的重视以及研究工作的展开。顾颉刚、洪煨莲、罗常培、李济之、潘光旦、范捷云、乐嗣炳等著名学者，都努力进行或热心提倡客家研究。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率先将“粤东人种”问题列为其重点研究项目之一，并物色合适人选担当此任。客家学者罗香林1930年从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留任研究院专治唐史与百越源流问题。由于罗香林具有客家背景和相关的治学经历，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委派他返回岭南故乡，实地考察“粤东人种”问题，并负责编辑《客家史料丛刊》。从此以后，客家研究从岭南客家文人圈步入中国学术界的殿堂，逐步发展成为学术界中的一门显学——客家学。

客家学是我国人文学科中的一颗明珠。它是一门新兴的学问，是在综合众多的人文学科，诸如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交叉学科。客家学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客家民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并揭示其形成和发展规律。这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由于涉及领域太多，要真正达到学术上的飞跃突破，绝非一朝一夕之易事。

海外的客家学研究有着相当悠久、丰富的实证和理论传统，中国的客家学研究必须与之交流，在本土研究与国际学术充分交流基础上构建真正领先世界的客家学。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嘉应学院客家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客家学界的重要阵地，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但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的客家学研究还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客家学研究为何能成为“显学”？这些华南山区与平原交接地带的人群为何又是何时开始被当作一个有着自身文化及地域特征的群体而被反复讨论？客家研究的主题到底有哪些？哪些有意义，哪些纯粹是臆测？这些主题产生的背景是什么？它们是如何通过一种社会与历史的双重作用，而产生某些政治、经济及至文化权力的诉求与争议的？

在此背景下，广东省普通高教人文社会科学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于2011年2月启动了“海外客家研究译著特别项目”，计划翻译和出版海外知名客家研究著作10部，并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签订了合作协议。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拟先行翻译和出版海外客家研究著作5部，兹简列如下：Ellen Oxfeld. 1993. *Blood, Sweet and Mahjong: Family and*

Enterprise in an Oversea Chinese Community (欧爱玲:《血、汗和麻将:一个海外客家华人社区的家庭与企业》).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Nicole Constable. 1994. *Christian Souls and Chinese Spirits: A Hakka Community in Hong Kong* (郭思嘉:《基督徒心灵与华人精神:香港的一个客家社区》).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yron L. Cohen. 1976. *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wan* (孔迈隆:《家合家分:台湾客家的家庭生活》).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Ellen Oxfeld. 2010. *Drink Water, but Remember the Source: Moral Discourse in a Chinese Village* (欧爱玲:《饮水思源:一个中国村庄的道德话语》). University of Columbia Press; Sow - Theng Leong. 1997.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as,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 (梁肇庭:《中国移民与族群的历史:客家人、棚民及他们的邻居》). Standord University Press。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让大陆客家研究者更好地了解国外、港澳台地区的客家学研究成果，大力促进客家研究的国际交流，推动客家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组织这套丛书的翻译和出版。嘉应学院地处海内外最大的客家聚居地，具有开展客家研究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被列入丛书的这些著作素来被视为海外客家研究的范本，体现了不同的学术旨趣和理论关怀，希望这些论著的出版能引起国内客家学界的关注，促进客家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

客家学既然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就需要不断汲取新的养分，允许“百家争鸣”，重视不同意见，不断欢迎新观点。在专家学者们的辛勤耕耘下，“客家学”研究终将达到学术上的逐步突破，臻于完善。我相信，零散的力量若能相对集中，累积的效果必将十分突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还相信，很多朋友都有推进学术、造福社会的美好夙愿，让我们共勉，并把这愿望变成具体的行动！

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院长 邱国锋

2012年12月18日

于广东梅州

前 言

本书讲述的是移居的个人和家庭、他们彼此之间与所认为的外人之间既和谐又冲突的关系，以及他们坚定的信念和相互矛盾的信仰和态度。我是通过考察在印度加尔各答的离散华人社区成员们的家庭动态发展、种族角色和观念取向来关注这些问题的。本书跨越时空来追溯社区成员的发展路径，他们最初从中国移居到印度及后来的迁入北美都囊括在我的研究范围内。

和许多研究课题一样，本课题一开始也不易明确地进行定义。我对东亚和南亚的文化和历史的兴趣可以追溯到高中时期，并在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进一步得到加强。大学毕业后，我有幸获得了托马斯·华生基金会的奖金（Thomas J. Watson Foundation Fellowship），这让我能够去中国台湾和香港学习中文并且还能游历泰国和印度。正是这趟旅行让我意识到加尔各答是一个极其令人着迷的海外华人社区的本部。我回到美国在哈佛大学学习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当要选择—一个地点做田野调查时，我断定对加尔各答华人社区进行调查能把我对中国文化、印度社会和少数民族群体面临的困境这些方面的兴趣结合在一起。

我真的特别幸运，因为我受到了加尔各答华人社区成员们的盛情款待，他们向我敞开了生活的大门。因此，我最感激的人是他们，但不可能一一感谢这么多帮助过我的社区成员。在此我尤其要感谢李秋芳（Lee Chiu Fong）、陈贵芳（Chen Kuin Fong）及他们的家庭。他们不仅仅是好客的主人，李秋芳还对我感兴趣的一些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他（现在仍然）源源不断向我提供信息和观点。

我也要向加尔各答的印度人类学调查所（Anthropological Survey of India）表示感谢，在1980~1982年我做研究期间加入了这个机构。那时

Hirendra K. Rakshit 是我的导师，他对我在做研究所需的一系列必要的官方认可的复杂程序上进行引导。Jyoti Sen 也是我在调查所的指导教师，他花了大量的时间来激发我的思想并提出建议。我于 1980 ~ 1981 年的田野调查由美国印度研究协会 [American Institute of Indian Studies (AIIS)] 资助，1981 ~ 1982 年期间我得到了国家资源奖学金 (National Resource Fellowship) 的财政资助。在这几年当中，加尔各答的美国印度研究协会主任 Tarun Mitra 对我的研究的运筹及与官方打交道方面提供了无可估量的帮助。Purnendu Bose 因其在印度电影中的摄像工作而出名，我与他在加尔各答的家人也是朋友，他们给我提供技术上的帮助和灵感上的启发，在卡利亚尼和加尔各答的巴苏一家人也是如此。

米德伯里学院 (Middlebury College) 专业发展基金会为我 1986 年夏天在多伦多的研究和 1989 年的加尔各答之旅提供了部分资助，此书的完成也得益于 1990 ~ 1991 年离开米德伯里学院外出做学术研究。我在多伦多期间，Dee、Peter Thompson 和 C. C. Chen 都给予我很大的帮助。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米德伯里学院内外许多优秀学者的敏锐洞察力使我受益匪浅。我尤其要感谢 Rubie Watson, Hill Gates, Stevan Harrell, Arthur Kleinman, Susan Brownell, Jean Burfoot, Lynel Long, Claudia Strauss, David Nugent, Jan Albers, Paul Monod, Shank Gilkeson, Susan Gray 和 Burke Rochford 对于我部分手稿独到的评论。也感谢 Nur Yalman, Sally Fak Moore, Ezra Vogel 和 Myron Cohen，他们读了我许多早期的资料并给出了宝贵的建议。在这方面，我也要提到后来的 Judith Strauch，她是我在哈佛的一位导师。尽管她未能见到我完成课题就离开人世，但她对海外华人和种族的研究是我学习的典范，我将永远记得她的帮助及与她的友谊。

我也感激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的匿名审稿人和康奈尔“当代人类学” (Anthropology of Contemporary Issues) 丛书的编辑 Roger Sanjek。他们的建议和批评让我的讨论更具有理论基础，最后一稿在人种学上也更有深度。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父母，Edith 和 Emil Oxfeld。他们无时无刻给予我精神上的支持，是永不知疲倦的校对员。他们用无尽的耐心和持久的幽默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文稿，并找出了众多不通顺的表达。

本书中三章的早期版本出现在下列期刊中：第四章原为《盈、亏和命

运：一个海外华人社区的企业道德和赌博行为》，载《现代中国》1991（17）2：227 - 259；第六章原为《一个海外华人社区的劳动性别分工及家庭和公司组织》，载《美国人种学者》1991（18）4：700 - 718；第八章原为《个人主义、整体主义和市场主义思想：一位华人企业家的回忆录》，载《文化人类学》1992（8）3：267 - 300。我也感谢塞奇出版社（Sage Publications）、《现代中国》的出版商和美国人类学协会及《美国人种学者和文化人类学》的出版商准许我再版（不是为了销售或进行复制）。

欧爱玲

米德伯里，佛蒙特州

关于中文罗马式拼音和中文姓名的注解

由于我用中文所进行的多数采访使用的是普通话而非客家语，所以本书中所有的中文表达都按照普通话用罗马字母拼写。除了直接引自他处的汉字外，这些表达依据拼音体系用罗马字母进行拼写。有些引语的汉字根据不同的罗马式拼音体系进行拼写，这些拼写与相对应的拼音有显著不同，所以我在括号里加入了拼音。引自中文和涉及加尔各答华人社区成员以及特指某一著名人物时，通常他们的姓在名的前面（如毛泽东写成 Mao Zedong）。当用英语指称文章或书籍的作者时，中文姓名的拼写是姓在后面。加尔各答和多伦多客家华人社区成员的姓名均为化名。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1
关于中文罗马式拼音和中文姓名的注解	4
第一章 家族发展轨迹与贱民企业：加尔各答的 客家华人制革商	1
第二章 种族框架下的研究	26
第三章 企业社区的出现：历史和社会机制	58
第四章 盈、亏与命运：赌博行为与企业道德	77
第五章 非瞬间的成功：第一代	100
第六章 “妻子的财富”：家庭劳动和收入的分配	118
第七章 “树的分支”：第二代和第三代的家庭与公司	146
第八章 个人主义、整体主义与利润动机：周先生的故事	171
后记 多伦多的移民和访客	195
参考文献	217
译后记	230

第一章

家族发展轨迹与贱民企业： 加尔各答的客家华人制革商

这是八月一个暖和的早晨，我走在多伦多东郊——士嘉堡（Scarborough）的街道上，街上空荡荡的，很安静，边上有一排排两层的砖房，此情此景令我的思绪回到了充满活力、人群密集的加尔各答街道，那是我1980~1982年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加尔各答由多个不同的种族、种姓和宗教团体组成，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城市。享誉世界的特蕾莎修女及其他致力于加尔各答贫民窟工作的人造成了人们普遍认为加尔各答贫穷的印象。的确，加尔各答存在贫困的现象，但是这个城市也是印度东北部的商业、工业和知识中心，它是一个多面的城市。正如记者威廉·史蒂文斯（William Stevens, 1983）曾写到的，“对于长久以来被描绘成终极的都市灾难区、一个正衰退的和人类绝对痛苦的城市，加尔各答很早就开始崛起，人们工作相当努力，这个城市散发出众多令人吃惊的活力。”

加尔各答的华人制革商——回忆场景

1980~1982年期间，及1985年和1989年的夏天，我在一个客家华人社区进行了田野调查，他们发现加尔各答的皮革业是一个利润丰厚的行业。客家人是一个独特的言语群体，他们居住在中国东南部省份的某些区域，如广东、福建和江西。但人们认为他们是几个世纪之前从华北移居到华南的。的确，在粤语中“hakka”这个词的意思是“客人”，说粤语的人认为他们自

己是广东本地人，客家人由此得名（科恩，1968，第247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少数加尔各答客家人开始涉足当地的皮革制造业。这个被高级种姓的印度教徒认为通常由贱民或穆斯林经营的污染性行业，却被证明是一项有利可图的收入来源。虽然加尔各答的华人总共不超过8000人，但客家人现在拥有并经营着那里绝大多数的皮革工厂。就印度全国而言，客家人对印度皮革业的贡献绝非微不足道。加尔各答是印度三大主要皮革业中心之一，仅次于南部的马德拉斯和北部的坎普尔。

加尔各答的华人不全是客家人。来自广东的说粤语的移民和来自中国中部省份的湖北人也在加尔各答定居。广东人主要从事木匠，而人数较少的湖北人的主要行业是开牙医诊所。此外，除了皮革业，客家人还拥有并经营鞋店、美发沙龙和餐馆。但皮革业是客家人从业人数最多的行业。迄今为止，客家人是三个华人群体中最大的一个。^①

华人的皮革厂区位于加尔各答东部外围的塔坝（Dhapa）（有时也称为Tangra或Tapsia，因为它横跨这两个地区）。这里大约有300家皮革厂，每间工厂的雇工大多在5~50名之间。这些工厂要么是两三层的混凝土楼房，要么是单层的瓦房，厂房连接着一条未铺砌的、泥泞的曲折小路以及开放式的下水道，用来排放鞣革过程中的废弃物。而处于这锈迹斑斑的工业环境中的皮革厂，既是客家人的住处，也是工作的地方。

每个工厂的门口都树立着的大木门令人印象深刻，在门的上方用汉字漆有每个企业的名字。当你经过这些门进入到主体制造区时，你会注意到糊在墙上用来装饰的印有金字的红纸。这是一些流行的中国谚语，大部分都表达了生意兴隆的愿望，比如，一本万利，意思是每投入一份成本，获取一百万倍的利润；货如轮转，则是希望生产的商品像车轮一样旋转，即有大的需求量。在工厂楼层的尽头常常设有供桌，上面摆放了一些民间流传的神灵，如佛教的仁慈之神观音、战争之神关公，但或许最重要的是财神和店神。还有

① 尽管加尔各答的人口普查从未按语言对中国人口进行分类，但客家人在人数上的优势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推断：有两所为客家学生开设的中文学校，为说粤语学生开设的仅有一所；此外，住在加尔各答的湖北人和广东人经常用客家话进行交谈，而较少的客家人学习粤语或广东话（一些接受调查的广东人和湖北人坚称这是客家话在加尔各答华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果）。皮革企业的数量（1980年大约有300家）也明显地确立了皮革业作为客家人最重要职业的地位。只有鞋店的数量与之差距最小（1980年有150家）。

一些能带来幸福、财富和长寿的神灵的塑像或画像——福、禄、寿也随处可见。

一旦进入到制革厂，你会注意到厨房和吃饭的地方都直接设置在工厂所在的楼层。华人妇女就在靠近印度雇工修刮原皮或把生牛皮扔进鞣革溶液的地方做饭。干的蔬菜就挂在干的兽皮边上。小孩子绕着工厂跑来跑去，中老年妇女通常坐在工厂的大门外面闲聊。清晨，你可以看到这些穿着睡衣的妇女在区中心附近的市场上采购食物。与此同时，印度的劳工把生皮递送到各家制革厂；制革厂的员工来到工厂开始一天的工作，他们大多是恰马尔人（Chamars），这是一个和皮革工作相关的处于贱民阶层的种姓。当天晚些时候，人们可以看到这些工人在烈日下把半成品的皮晒干钉在木板上。

制革的场区给人留下的是一种复杂的印象。鞣革过程中散发出的气味，工人们在烈日下流汗，手推车、卡车及机器全部都表明这是一个工业场所。孩子们到处跑来跑去地玩着，从小贩那里买零食；一群华人妇女或站或坐在工厂大门前说着家长里短，这些现象表明了这是个住宅区。工业垃圾、泥土及臭味简直就不能让人把这些户外的区域当成花园来休闲。然而，制革厂内的居住区的面积却常很大并且设施完备。

卧室里面，中式的门帘凸显了制作精巧的木质结构，通常这些帘布绣有精美的鸟、树和花的图案；房间里也有最新流行的小型高科技消费产品（1982年我在当地的时候，盒式磁带录像机才刚刚流行起来）；皮革似乎处处都有，这一直提示着我们这个社区人们所从事的职业，皮革不仅用来遮座椅，而且大块的皮革用来遮盖宽的木床，以便在睡觉、闲聊、喝茶时给人凉爽和舒适的感觉，还可用来供小孩玩耍。

五年后——多伦多的加尔各答华人家庭

所有上述提到的画面，甚至我对恶臭的鞣革的记忆都在1986年多伦多这个八月特别的早晨再次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或许这是因为我走的这条街道异常整洁，没有一个人经过，与制革场区截然不同。然而，在我脑海中这种联系却是自然而然的，我将去采访来自加尔各答华人社区的一个认识的人。

思绪倒回到加尔各答，孔先生的皮革生意很是兴隆，两个儿子已经结婚，帮他照料日常的运作，所以他既有时间又有资金能经常出国旅游。特别